

迟到的缘分

何志云

廣益旅遊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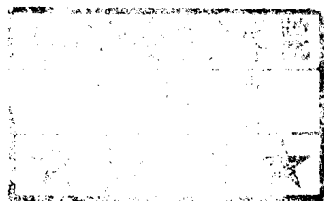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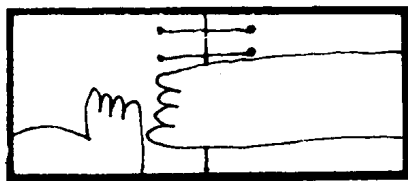
81597

遲到的緣分

何志云



200407700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出版社登记证号：（粤）新登字08号

书 名	迟到的缘分
作 者	何 志 云
出版发行	广东旅游出版社 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)
经 销	广东省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 本	787×960毫米 32开本
印 张	7.375印张
字 数	122千字
版 次	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—4000册
书 号	ISBN 7-80521-318-6/I·135
定 价	3.90元

人生是一部大书。

《人生》丛书收入了当今文坛画坛名流的精彩之作。不求宏大之规模，是以少而精见著。

本丛书更不拘泥于体例风格之一致。乃求不拘一格，自由浪漫。天阔地广，任放马由缰，谈个痛快，——人生之种种，尽在笔下。故有诗有文，有歌有哭，但全部都是作者心灵的声音。

自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因此才会有生命的灿烂，——

我们将一世去追求。

我 是 谁

——代自序

近几年来，我常常对所谓的“自我介绍”产生疑惑。人对于“我是谁”这样的问题，许多时候都不曾搞清楚，那介绍，其实无异于镜里花，水中月。

我是谁？

拿这个问题毫不留情地逼问自己，就象禅宗所说的“直指本心”，我发现，原来构成我认识自己的种种因素，只不过全是参照物，“我”其实深藏在这些参照物织成的网络之中。

对于年迈的母亲，我是她的儿子；对于年幼的儿子，我是一个父亲；对于妻子，我是丈夫；而对于朋友，我也是朋友；对于上级，我是该竭力尽职的下属；对于下属，我又是该负责的领导；对于其他报刊，我是个作家，须不断地熬夜为他们写文章；而对于我正供职的杂志，我是个编辑，又需不

断地去逼别人写文章……

我就处在这样的社会、家庭网络之中。按照这一网络为我规定的名份，也按照社会明文颁布或约定俗成的各种法律、法规、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，我得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名份。

在有些人眼里，这也许是我“没出息”。我当然能理解这三个字背后的涵义，何况现在又到了崇尚个性第一，追求自我价值的时代。这应当是无可厚非的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如同人们很少问及自己“我是谁”一样，许多人在提倡“个性”与“自我”的时候，也并未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。假如“个性”就是随心所欲，“自我”便是自私自利，那么它们便形同于生物性，其实这在同时也就丧失了自身。

说到题外话了，赶紧打住。

我得承认，我并非就是个正人君子。当我在尽自己的本份时，也常有邪念，有过抱怨，甚至还有过种种逃避或者摆脱这些名份的谋划。当然这一切最终都归入了烟消云散。

不能简单地把它们解释为我的某种“软弱”。在骨子里，我自认为自己颇有点硬气，有时甚至可以“横竖横”到不顾一切的地步。仅以写文章为例，我从1972年为《青春之歌》撰文翻案起，到以后为一批“有争议作品”执言辩护，都不是件说说而已的轻松

事。我这么说不是在“自卖自夸”，读者诸君想能明鉴。

但我所以仍然尽着自己的名份，是因为我归根结蒂摆脱不了“责任感”。名份意味着我与他人的确定性联系，同时便意味着责任的规定与履行。不承认这一切，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是一种活法；拘宥于这一切，克勤克俭，尽心尽力，也是一种活法。人，对于各种各样的活法，最好不去作非此则彼的评判，而是去作各自的选择，然后老实实在地对世人承认。

可是我的这种活法，甚至都很难说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也许，从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成长而来的一代人中，大多数都能理解我这么说的涵义。我其实早就已经被“造就”了。这种“造就”渗透了我的全身心，然后把一种特定的活法提供给了我。虽然在内心深处常常会有“反叛”的冲动，但“反叛”的实施只能是一种人格的分裂，然后相伴而来更深也更难的新痛苦。

既然世界上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活法，既然各种活法各有各的理由，既然我已经在“造就”中被规定了活法，那么，为什么只有摆脱和逃避才是出路呢？按我的活法踏踏实实地活着，活一天就尽一天自己的本份以到人生的尽头，难道不正是对这种活法的战胜？人，就会在完成对象中战胜了对象。

何况，这样的活法并没有太多值得抱怨的理由。抱怨其实来源于对人生目标的自我设定。想当一个作家，渴望着功成名就，就势必抱怨种种妨碍人到达这目标的因素；想出则轻裘肥马，入则娇妻美食，就必定会抱怨那难以尽如人意的种种条件。人，总要为自己短暂的人生设计出种种的目标，然后为了实现它们处心积虑，惹尽烦恼。但是，谁规定人生就必须以这类目标的是否实现为有无价值的衡量标准？人生就如同在沙滩上走路，走到尽头就只能是坟墓，留在背后的脚印却有深有浅，那里盛着真正的价值。

心怀坦荡，认真地踏实地活着，足矣。

现在常让我厌烦的，倒是“作家”这个头衔。既为作家，虽然并非是我的专业，也难免要在文学圈子里厮混；东西多多少少也须写些出来。

但现在的文坛，热闹固然是热闹，可也绝非净土。争名于朝者有之，争利于市者亦有之，争当各种协会理事、主席者更是不乏其人；在这些人手里，文学已经离开了它自身，成了犹如科举一般的敲门砖。厕身这些人之间，怎不让人觉得累烦？

另一方面，一些过于把文学当回事儿的朋友们，又不断地打出新旗号，推出新观念，越来越把文学弄成仿佛是文学家自己的事儿。而社会和读者

们呢，则越来越对这种纯粹的文学抱以冷漠之情。

文学搞到这个份儿，还有个什么劲？所以我干脆不和文学界来往，爱写什么就写^啥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毁毁誉誉，荣荣辱辱，一概置之不理。如果非要谈文学，我宁肯多听听文学圈子外头的人的话，哪怕浅近，哪怕鄙俗，哪怕登不上大雅之堂。有点时间了，不妨去逛逛市场，听个体户说他们怎么充大爷又怎么装孙子；或者，找个小酒铺，要几两二锅头，一碟花生米，听刚歇下平板车，敞胸露怀的老师傅骂大街，发牢骚。半夜睡不着觉，站在阳台上，看星空下几个清洁工人一扫帚一扫帚地扫着地，远处传来一串叽叽喳喳的打趣声和嘻笑声，知道是下中班的女工在回家去，便精度对面楼亮着灯的窗户里，等着她们的不知是父母还是丈夫。这时候，我心里就会觉得一种和文学全然没有关系的踏实和清爽。

对于一个作家，他怎么去看待和把握文学，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他的活法。我要求我的文学观无非是我的活法的一部分。不瞒各位说，看待其他作家，我很少注意他们的宣言。我常这样去发现作家同行们各自的灵魂。

其他还能说些什么呢？剩下来的“我”，就只有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了：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。当然，面对这一切，我也有自己的原则。简略说来，

遇事只讲道理，不计后果；交友只看人品，不计其他；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不负天下人，但谁若负我一次，便宁肯割席断交，绝不再虚与委蛇；最不愿理睬的是面上光鲜，肚里腌臢的巧伪人，最瞧不起的是无信、无情、无义、无廉耻的宵小之徒；从不愿扫朋友们的兴，并不管心里是否情愿；平日嗜好烟酒，亦不论与健康是否有碍。最常用的休息方式是读武侠小说、《飞碟探索》杂志和听音乐。

还有一个时常牵绕心怀的梦想，听说我的祖父是挑着一副豆腐担子，从绍兴老家一路打工一路流浪而来杭州的，我总抑制不住地把那个挑担子的人想象就是我。当然，我知道这真正是一种梦想。

这就是关于我对于自己所能说的一切。

他是绍兴人

——何志云印象

丁道希

大概是1983年元旦吧，那时还是条“光棍”的肖立军，突然想起要过元旦了。我也住在恭王府办公室里，假模假样也算是条光棍，于是，两条“光棍”一核计，咱们开个联欢晚会吧！请来了十多个人，各带吃喝，随便玩乐。可跳舞，可听音乐，也可喝点酒，吃点菜。地点就在我办公的一个大房间，人呢，一是我请的我们全国文联机关的几个年青人，二是肖立军请的他的北大荒“哥们儿”。凑成一团，好不热闹。边吃边喝，边跳边说，梁晓声两口子话语不多，保持着他那作家的沉思。可雄与星儿，倒是翩翩起舞，颇有几分上海滩的风采。只有一位戴眼镜，瘦瘦的年轻人，颇能饮酒，也健谈，引起了我的好奇。不知因何缘由，有人问起谁是“布尔什维克”，席间一时愣住了。这位戴眼镜的青年却

率先说道：“我是，怎样？”一问，绝大多数都是，倒是我们两个主人才是“民主人士”。接下来，这位“布尔什维克”同其夫人跳起舞来，其间还搀合着他那两岁多的儿子都都。可惜，他有点弯腰，跳的并不十分好——但文质彬彬，显出一副很有教养的神情。他就是何志云。

他善饮，不多饮，自然不醉。他还很能够用牙齿咬掉酒瓶盖儿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仿佛谁的牙齿也没他的那么结实。

这也许就是他对人生的态度：挚着而不偏狭，热情而又有节制。于冷峻中保留着赤子之心，在别人上火升温时他又能泼几瓢冰水。

我实在不适应别人用年龄来划分艺术家、评论家的第几代，第几代。按这种划分，我和何志云就不是“一代”，但又实在看不出不是一代。在某些时候，也许可以说在很多时候，他比我显得更为老成持重。但在有的时候，他也有天真，稚嫩的心态。他常说：“什么事哇？道希！别放在心上，仔细想想，不就是那么点事么？”

他这是在劝慰我，但也可看作是他从事文艺活动的一个注脚。

他写了上百万的评论文章，还有二十多篇中短

篇小说。可他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人。他的有些文章象关于张辛欣的《圆的形象与扁的评价》，象关于《晚霞消逝的时候》的评论，都引起了不少的波澜。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李剑作品的文章，坚持说理，重在分析，竟不期引起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注意。这位负责同志在批给文艺界几位宿老的信中说道：这篇文章建议看一看，这是一篇充分说理的文章，根本没打棍子。我对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充满信心，建议你们每年也写一篇……可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万万没想到，写这篇文章的人当年只有三十来岁，没有大学文凭，没有资历与地位。

1950年，何志云出生在杭州一个城市贫民家里。父母均从绍兴乡下迁来，家中几乎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。父亲辛劳一辈子，给他的遗产就是一副铮铮傲骨，一股绍兴人的脾气。他父亲拉过黄包车，由于日本人的一顿打，气得扔掉黄包车，再也不干任何事了！父亲的一位朋友发了迹，有了几文臭钱，他却赶去要回来原先送给他的几件家具，当着这位“暴发户”的面，劈毁了事——沾了臭气的东西，不要了！当年混社会的一位头头“螺丝阿公”，挺讲义气的，对他父亲也不错。就因为与日本占领军沾了边，他父亲从此挨饿也不与“螺丝阿公”来往。这股“绍兴脾气”也传给了少年的何志云，包括

篇小说。可他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人。他的有些文章象关于张辛欣的《圆的形象与扁的评价》，象关于《晚霞消逝的时候》的评论，都引起了不少的波澜。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李剑作品的文章，坚持说理，重在分析，竟不期引起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注意。这位负责同志在批给文艺界几位宿老的信中说道：这篇文章建议看一看，这是一篇充分说理的文章，根本没打棍子。我对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充满信心，建议你们每年也写一篇……可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万万没想到，写这篇文章的人当年只有三十来岁，没有大学文凭，没有资历与地位。

1950年，何志云出生在杭州一个城市贫民家里。父母均从绍兴乡下迁来，家中几乎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。父亲辛劳一辈子，给他的遗产就是一副铮铮傲骨，一股绍兴人的脾气。他父亲拉过黄包车，由于日本人的一顿打，气得扔掉黄包车，再也不干任何事了！父亲的一位朋友发了迹，有了几文臭钱，他却赶去要回来原先送给他的几件家具，当着这位“暴发户”的面，劈毁了事——沾了臭气的东西，不要了！当年混社会的一位头头“螺丝阿公”，挺讲义气的，对他父亲也不错。就因为与日本占领军沾了边，他父亲从此挨饿也不与“螺丝阿公”来往。这股“绍兴脾气”也传给了少年的何志云，包括

到了几篇批《青春之歌》的文章，他的热血沸腾了，好似饮了一罐“花雕”。这是他最钟爱的书呀！还在他戴红领巾的时代，他从大哥手里要来了这本书，他是那样喜欢这本书，那样深情地与林道静、卢嘉川、江华一道共忧患，同欢乐。这怎么能是坏书，于是，他真的“义愤填膺”，真的感到“文字缘同骨肉亲”了，当即写下了《一曲民主革命时期革命青年的赞歌——评〈青春之歌〉》的万字长文，发表在黑龙江的《图书评论》上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人们由此盛传：何志云这下子可要倒霉了！批判的文章接二连三，声讨的呼声不绝于耳！何志云，看你能否不坠青云之志！

写在这儿，我想起了杨沫同志。我多次见到这位襟怀坦荡，才华横溢的老作家，总想同她谈谈何志云，也谈谈我自己。我也是《青春之歌》的忠实读者，但我却没那份勇气来写这样的文章。何志云却写了，也承担了那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不堪承担的压力。后来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他调来北京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社，他明知杨沫同志当时就住在恭王府西侧，他常常中午或晚上骑着自行车到我这儿小酌两盅，高谈阔论一番。但他却从没去打搅一次杨沫同志，并不只是“清高”，也不仅仅是不好意思，反正何志云就是这副德行。杨沫同志如果看到这篇文

章，她应该庆幸，她的作品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了多么宝贵的财富。她也可以嗔怪何志云这副绍兴人的臭脾气！

怪就怪在这儿。写了这篇挨批的文章后，何志云还照样入了党。我说：这才真叫绝了！他说：绝吗？我想这叫：骨气、民心、地利。骨气，他是有的。民心，是当时谁都痛恨“四人帮”那一套，批都批麻木了，还在乎多批一个何志云？地利呢？黑龙江“天高皇帝远”，又碰上几个开明的领导。于是也就悄悄过了关。1975年，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，各方面都有了转机。何志云也有幸被当时主持黑龙江省文艺工作的同志看中，调进了省文化局，任专职评论员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有了学习的好条件，当时的“创办”资料室，是“胡风分子”鲁琪任资料员，《黑龙江文艺》编辑部是评论家“右派”唐因任资料员。不想，这二位老同志都成了何志云的学习资料供给人。他说他除了借书外，就同鲁琪下围棋，陪唐因聊天。鲁琪同志围棋够得上几段，不太了解。唐因同志聊天是可以评上八、九段的，这我知道。他与达成同志一聊起来可以通宵达旦。然而何志云同谁一道饮酒呢？他没告诉我，反正酒友易得，棋朋书友难觅。

就这样，打鱼摸虾里的沉思，下棋聊天中的学习，交织成了何志云少年时代的生涯。他，象高尔基《在人间》中所描叙的那样，苦苦思索着，不懈地苦读着，遂完成了他的人生的学业。他没有大学文凭，与我这个有“硕士”空衔的人交谈，却时常令我瞠目结舌。他的评论，犀利，简洁，一语中的，颇有名士气概。他的小说，评者不多，实际上自成一格，清新俊逸，富有大家气派，故事性不那么强，却使你手不释卷，人物不多，你看后总记得住。以前，我总私下不以为然，一个第一流评论家，何苦去写第三流的小说？看了他的小说后，我大吃一惊，妈妈的，何志云真有他的！

大概是1985年的春上，我和何志云、高行健，受陈建功的“唆使”，去了一趟开封。我们受到开封市文联热情的接待，我们胡讲了一通，住了几天，看了不少中原文化的遗址。行健是有名的“高疯子”，一股书生气。我也强不了多少，倒是小我们不少的何志云四处张罗酬酢。住在那个我们戏称为“现代骡马店”的宾馆里，有“洋人”来就要赶我们走，是他去交涉，吓唬他们“我们的行健”上了“世界名人录”的。我也赶忙补充：那些“洋人”也不一定是名人，谁知道他们在国外是不是捡垃圾的？到后来火车票难买，只买到两张卧铺票，又是何志